

外国语言文学文化论丛

外语·翻译·文化

杜争鸣 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

外语·翻译·文化

杜争鸣 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语·翻译·文化/杜争鸣著.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6. 12

(外国语言文学文化论丛)

ISBN 7—5641—0579—8

I. 外... II. 杜... III. ①外语教学 ②翻译理论
IV. ①H09 ②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54864 号

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京四牌楼 2 号 邮编 210096)

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mm×1168mm 1/32 总印张: 48.25 总字数: 1343 千字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50.00 元

(凡因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读者服务部调换。电话: 025—83792328)

作者简介



杜争鸣，陕西西安人。1982年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学院英语系；1989年在西安外国语学院获文学硕士学位；先后在商业部西安生漆研究所、西北纺织学院、苏州大学从事编辑、翻译与外语教学工作。1999至2000年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进修翻译研究方向博士研究生学位课程，兼任北京新东方外语学校翻译课首席主讲教师。长期从事英汉与汉英翻译实践工作，正式出版译著、诗文及图册翻译累计约130万字，发表论文14篇。现执教于江苏省苏州大学，教授本科、研究生翻译（口笔译）及语言文化对比研究课程，指导翻译研究方向硕士研究生。

内 容 简 介

该书以外语学习、教育与文化的关系出发,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阐述外语学习、翻译、文化三者的关系,是近年来作者在外语教学与实践方面的一些基本思想的比较全面的总结。全书实际上由多篇论文组成,按照其不同的侧重点和阐述角度,分为四个部分,具体如下:

第一编“外语教学与文化、翻译”从外语教学中的理解问题出发,讨论外语学习与文化背景知识的关系,得出文化知识是外语学习的基础这一观点,并针对大学英语流行教材中的一些实际问题,阐述了背景知识(信息)对外语理解的重要作用,批评了照搬国外原版教材,在教学中把获取一般知识和获得语言本身的知识和能力混为一谈的错误倾向和由此造成的不良后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了在中国学习、使用英语的具体问题和中国英语的性质、中国的英语教育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中国英语教学应该有自己的特色的主张,并在最后阐述了外语教学与翻译的关系问题。

第二编“翻译中的文化与文化中的翻译”重点探讨翻译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及二者结合的角度分析文化语境、社会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具体影响。作者首先通过具体翔实的资料说明各种翻译策略和翻译技巧背后都有社会意识形态这一个强大的影响因素,翻译表面上是翻译语言,实际上是不同文化意识形态的接触、冲撞、相互影响和渗透,所以学习运用一般的翻译技巧只是翻译的基础阶段,而根据文化意识形态和翻译的具体目的、读者对象对各种可能的翻译进行甄别和选择才是翻译实践能力的较高体现,历史上和现实中的翻译实际上都存在着编写的性质,增译、减译甚至不译等翻译实践的具体实践问题,这都应该理解为正常的翻译。另外,由于翻译必然受到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译者对译文的主观操纵也

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第三编“翻译的语言与翻译的话语”主要从篇章/话语结构的角度和英汉语言思维对比的角度讨论分析英汉互译中的具体问题,通过实例分析强调说明翻译的语言转换单位不是字词和句子,而是篇章和话语,而篇章和话语与特定的语言思维习惯密切联系,难以割裂,所以翻译实践是一种文化思维模式转换游戏,而不是在不同的语言中寻求“等值”的或“对等”的表达法。这也是对长期流行于翻译研究领域的一种神话的批判。

第四编“口译的语言理解与语言技巧”以三篇有关口译的文章组成,分别讨论了同声传译的语言理解与一般的语法理解的不同之处,通过分析同传译员所使用的“断句”或“截句”技巧重新在超越语法理解的层次上理解语言,讨论同声传译的不同方法与文体之间的关系,并对一些错误的理解和提法做了中肯的分析和批评。

自序

2000年夏,我因身体原因被迫中断了在北京大学攻读翻译方向博士研究生的学业,回苏州修养期间渐渐打消了读书深造的欲念,同时产生了另一个欲念:将自己的思想和已发表的论文汇集成册出版,这就是本书的缘起吧。

作为一个专业外语教师,谈翻译必然联系到外语学习,而我在手头正在编写、拟定于2007年出版的《自然英语学习法》中,从一开始就用很多篇幅着重阐述了母语及翻译在外语学习中不可忽视的巨大作用,原因就是利用母语与翻译是自然、轻松并因此而具有最高效率的学习方法。那么,为自己这本以翻译为主题的书作序,也还得从我学习外语的经历及其与翻译的关系说起。

我在“文革”期间的中学就开始有外语课,但是作为专业学习则是在1982年。那年冬季的一天,我怀着一种久久期待而又有些焦虑不安的心情,离开了我下乡插队居住的那座普通的小土屋和那盏每晚伴着我的小小煤油灯,在苍茫的北方天空下,沿着弯弯曲曲、崎岖不平的田间小道穿过白雪茫茫的空旷原野,来到我国外语教育界著名教授李赋宁先生的故乡陕西蒲城县县城参加了中国“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第一次全国性高考。两个多月后,我收到了标志着我人生转折的西安外国语学院入学通知书,随后离开陕西蒲城县那个仅有19户人家的小村落,返回故城西安开始了四年的外语专业学习。

我考大学依靠的是“文革”学习中的仅有的一点点基础,而我们这点基础在打造的时候从来没有离开过翻译。比如,我们学习的第一句英语就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这就是翻译,学过一两遍以后似乎没有人记不住,而且不需要语法概念就可以理解:long live就是“万岁”的意思,英语放在前面。在后来学习英语的过程中,我们总

是首先看翻译,不然就是看到英语就先搞明白中文究竟是什么意思,翻译出来,或者干脆以汉语翻译成英语的文章为学习内容,比如《毛泽东选集》中的“老三篇”的英语。这些内容我们这一代和前一代人都非常熟悉,所以看到英文就能想起原文,很多从来没有见过的词也不用查词典就明白。由于提前了解意思,理解英语的内容没有问题,所以学习时注意力自然集中到了英语的语言结构特点上,印象十分深刻。然而,进入大学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学校要求老师用英语授课,学生上课也不能讲汉语,这让我们感到为难了。我们是一边不由自主地利用翻译,学习时或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进行翻译,一边又在当时所谓的“直接法”、“听说法”外语教学观念的引导下有意识地排斥翻译,生怕翻译把所谓的“母语影响”带入外语,造成外语不纯正的不良结果。现在回想起来,深切感到这种矛盾心理和进退两难的学习姿态确实对外语学习的效率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这就像在一条本来很坚实、平坦的大道上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地试探着步子前行,不知不觉中浪费了很多精力和时间。记得当时上课时,即使一个较难的英文词有十分贴切的中文译文就在嘴边,但是谁也不会大胆开口把它说出来,老师也是不惜时间地用英语绕着圈子不断解释,直到大多数同学点头表示明白为止。为了回避母语和翻译我们究竟浪费了多少时间?谁也无法精确计算,可是,不论多少,都已是过去。世上是没有后悔药的……

当然,那时这样走过大学专业外语学习历程的不只我一个,甚至可以说大多数同学都是这样的。大学整整四年里我们没有上过一节翻译课,所有的老师也都闭口不谈翻译,如果偶然提到,也是说学外语不要翻译,要用原文思考之类的说法。实际上,由于我们确实无法忘记母语,总是不由自主地借助翻译用母语思考,所以常常在学习过程中感到一种负罪感,在我们很多人的心理上都构成了一种负担,因为总觉得自己利用翻译和母语学习外语是投机取巧、不努力的表现。

不过,当时也有少数同学没有绕多少圈子,他们也和我们中间很多人一样,考大学前是依靠当时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毛泽东

选集》的英文本学习、提高的英语，从一开始就利用了翻译，而且是自己对原文早已滚瓜烂熟的翻译，大学学习过程中由于一开始就成绩突出，所以经常将中英文联系起来也没有受到多少指责，估计心里也不一定有很多人消除不了的借用母语学习的负罪感。这些人中，比较突出的三个人毕业后一个分配到令人羡慕的西北大学工作，另外两个留西安外语学院工作一年左右后考取了北京外国语学院当时刚开办不久的联合国同声传译培训班，最后走进联合国干脆以职业翻译为生涯了。

值得庆幸的是，这种弯路走得时间还不算长。大学毕业后不久，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促使我开始对翻译产生了新的感性认识：1984年到1985年间，我们的一位同班同学偶然从一位外国朋友那里搞到了一本以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军阀割据为背景的英文长篇小说 *The Warlord*（《军阀》），并引起了陕西人民出版社主要负责人出版该书译本的兴趣，我和六七个同学一起参与了这本厚达近700页的巨著的翻译工作，边翻译边讨论，互相学习，感到收获很大。我初次尝到了翻译的甜头，从此以后，我的外语学习、巩固与提高的过程便与翻译密切结合了起来，学习的效率从此也开始大大提高。在翻译此书的过程中，我第一次明确认识到，理解英文不等于能够翻译成正常的汉语，而翻译汉语又对理解原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必须深入、精确，既理解语言表层结构，又体会、把握其深层意义。通过翻译，我开始有了英汉两种语言与思维方式比较的意识，结果是英汉双语互相促进，二者都得到提高。于是，在翻译完这本书后，凡是有翻译的事情，我都看作是学习提高的机会，基本上都没有放弃过，零零碎碎也做了不少，也连续出版了几本书。

大学时代，我们所有师生对翻译的认识远远不像今天这么复杂，最简单的基本认识就是：在学习外语的过程中不能翻译，但是只要外语学好了就可以做翻译！

二十多年过去后，今天还有多少学习外语的人持这种观念？好像还没有人做过全面调查，但是至少在外语教育理论研究界人们对

外语学习过程中所谓的“母语干扰”或“母语影响”已经有了明显更全面的认识,越来越多的声音都从不同的角度肯定了母语与翻译在外语学习中的作用。与此同时,随着国际社会交流需要的猛增,翻译作为一个充满希望的新行业在全国势如破竹地迅速发展,促使外语教育界将翻译教学作为一个新的专业增长点加以扩大,也促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学好外语未必就能做好翻译,它需要专门训练才能做好,是一种以双语和双语文化修养为基础的特殊能力。不仅如此,有人甚至认为翻译不仅需要训练,还需要一种天赋才能:做文学翻译(如诗词等)必须有悟性和灵感,而从事口译工作则必须天生思维敏捷,有超常的心理和生理抗压素质。总之,专业翻译工作者地位空前提高,他们的工作成了很多人心目中一种令人羡慕、值得尊敬的职业。

近年来,在翻译行业和翻译教学长足发展的同时,翻译理论研究也呈现出了一系列高潮,经过多年来一系列讨论、争议,研究界普遍认为,翻译决不仅仅是一种语言文字之间的转换活动,翻译实践不能限于在语言文字转换过程中寻求所谓的“等值”;它是一种跨时空、跨历史、跨文化、跨学科分野的综合领域,研究翻译也不仅涉及语言学本身,而且与文化研究、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美学、阐释学等众多领域有关联,是一门具有很高综合性的跨学科研究,其性质非常复杂,远非其他学科那样相对稳定和单纯。

说到翻译的基础,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排斥外语语言功底的重大作用;说到外语语言功底的形成,我们也无法排除翻译学习法的重大作用。对这一点,我1999年在北京新东方语言学校第一次主讲该校翻译课时就写到了自己的备课笔记中并用来鼓励学生的话:一方面,从事翻译需要在所翻译的两种语言方面都有扎实的功底,但这绝不意味着只要两种语言功底好就无需学习翻译;另一方面,语言水平的高低永远是相对的,语言学习也永远没有止境。因此,我们也不能认为只有语言功底扎实,语言水平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以后才能学习或从事翻译。相反,翻译能力与语言水平的提高具有明显的互

动关系。从事翻译的基础条件是良好的双语功底,但是学习翻译又是进一步打好双语基础的有效途径。

外语与翻译不可分离,这一点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外语的性质所决定的:即外语对生活在母语单语环境中的成人而言是在已有的母语与基于母语的知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第二语言,它无法摆脱母语的影响。对此,我也在我的《自然英语学习法》中作了比较详细的阐述,在本书中就不再多说了。而对于外语及翻译与文化的关系,我在本书中收录的有关“中国英语”、“世界英语”、“翻译的社会语言学与跨文化含义”等文章中都有专门讨论,其他文章也从不同的侧面通过实例作了具体分析。总之,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本身就是文化,而且是最全面、最集中地体现文化的部分。语言虽然是人的创造,但根据语言相对论的观点,人的思维又在一定意义上受到语言的影响,所以人也是语言的产物。语言学习是文化学习,而翻译就是文化比较和交流,互通有无,借用外来文化的“他山之石”攻我之玉,丰富、发展本民族文化。在当今全球主义语境中,翻译意味着人类信息的共享,新知的传播,文明的互动;在蒙蔽与开明,民主与集权,自由与专制的对峙中,它必然成为人道、和平、进步的武器。从这一点来看,翻译也不是简单的文字转换,而是思维方式的调整与更新,是新文化、新思维方式的学习。

本书所选文章基本上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作者本人也不是翻译理论家,间或涉及一点理论皮毛,也是出于讨论具体翻译实践问题的需要。从外语到翻译,再到外语与翻译中所涉及的文化交流问题,通过具体的翻译实例进行客观地讨论,这就是本书的主要内容。但是,我仍然希望它能为翻译理论研究的探索提供一些实践方面可资借鉴的材料,同时对外语学习与教学的深入发展有一点贡献。

杜争鸣
2006年10月于苏州

目 录

第一编 外语教学与文化、翻译

大学外语阅读难度问题初探

——关于外语理解与文化知识的最初思考…………… (3)

中国英语问题及其他…………… (8)

世界英语语境与中国英语中的语言与文化教育 …… (26)

外语教学与翻译刍议 …… (43)

第二编 翻译中的文化与文化中的翻译

论意译,直译,不译的社会语言学与跨文化交际涵义 …… (53)

在语言翻译、话语转型与文化诠释之间选择

——关于《孙子兵法传世典藏本》前言英译的思考 …… (62)

诗词翻译中的文化增译例谈 …… (74)

“花窗”的“空间”与“文化空缺”

——通过“花窗”英译个案看文化空缺填补的原则与方法
…………… (81)

是谁准备了这盛大的晚宴?

——“隐形的译者”与“中国化”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 … (89)

第三编 翻译的语言与翻译的话语

语言节奏与翻译…………… (105)

连贯与文体:关于英汉语篇翻译中的交际力度问题 (111)

诗歌翻译中的“形式对等”与话语对应

——兼与黄国文教授商榷《天净沙·秋思》英译 (122)

一部学术精华,几个翻译问题

——《结构功能语言学》(序)翻译中的可改进之处 (137)

从苏州大学校训中英文管窥中英互译原理 (147)

“月落乌啼霜满天”——汪榕培先生译诗访谈

——汪榕培先生译《枫桥夜泊》全程实录 (151)

散文如歌

——例谈抒情散文韵味的翻译保留 (162)

第四编 口译的语言理解与语言技巧

英汉同声传译中的“断点”浅议 (173)

同声传译中的“等待”

——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178)

汉英同声传译的时差控制与文体变化 (189)

第一编

外语教学与文化、翻译

大学外语阅读难度问题初探

——关于外语理解与文化知识的最初思考

摘 要 阅读过程中的阅读难度取决于多种具体因素及相互关系。读者对阅读材料的熟悉程度和对语言本身的熟悉程度相互补充,与阅读难度成反比;阅读的时间、速度要求及强制性强度相互牵制,与阅读难度成正比。控制阅读难度在于调节这种比例关系,使材料、目的、方法相适应。

关键词 阅读难度(Degree of Reading Difficulty), 阅读过程(Reading Process)

一、引言

“听说读写”和“听说领先”只是学习母语的自然过程,未必是学习外语的过程。

我国普通高校外语教育的现状是:

1. 绝大多数外语教师并非从小开始学习外语,有些甚至是半路出家、自学成才的,受过外语文化长期熏陶的人更是凤毛麟角。因此,教师的外语阅读水平远远高出他们的听说水平。

2. 学生学习外语一般都始于中学,在中学养成了注重语法和阅读、忽视听说训练的习惯,因此很难听懂外语讲课,阅读能力一般也强于听说能力。

3. 语言实验及有关视听设备严重缺乏,学生上课全班人数过多,难以有效地进行课堂听说训练。

这些现实条件使我们不得不把阅读教学作为外语教学的首要途

径来考虑。

要有效地进行阅读教学,就要首先掌握阅读过程本身的规律。本文认为掌握阅读规律的关键在于掌握阅读难度的规律,只有充分认识和掌握阅读难度规律才能具体分析学生的阅读障碍并客观地评价他们的阅读能力。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谈到阅读教学法优化问题和阅读教材的改革和完善问题。

二、阅读难度规律的探讨

阅读难度规律的复杂性在于难度是一个包含着心理因素的概念,不仅取决于阅读材料本身,而且因人而异,直接涉及到阅读的性质和目的。

首先,阅读难度与读者对阅读材料的语言形式和它所包含的信息的熟悉程度有直接关系。既熟悉材料的语言形式又熟悉其中的信息,阅读自然会很容易;对二者都不熟悉,阅读则很难进行;只熟悉其中之一,阅读难度则较高;十分熟悉其中之一,另一方面不太熟悉,则难度就不会很高。一般情况是读者对两方面都比较熟悉,只是两种熟悉程度有所差异而已。

阅读材料的语言形式和信息内容之间存在着一种互补关系,阅读难度可通过这两个因素调节。有些科技专业人员的外语水平并不高,但能翻译专业著作,有些外语专业人员通过翻译某一科技专业外文资料可成为这个专业的内行,这些都是语言形式与语言信息内容在阅读过程中相互补充的例证。遗憾的是这种互补关系在外语教学中还没有受到充分的重视和利用。通过语言获取信息是阅读的一般目的,很容易受到注意,而通过信息理解语言是一种特殊情况(如根据动作、表情或上下文理解意思),不容易受到普遍的重视。目前外语教学中存在的推崇外国原版教材,主张教材内容新颖、广泛的倾向就反映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这一点我们下面还要举例具体讨论。

阅读难度(Degree of Reading Difficulty)与读者对阅读材料的语言的熟悉程度(Familiarity with the Language)和对其中的信息的